



# 追尋人類學家的足跡： 百年回顧與前瞻

林淑蓉\*

人類學門有機會參與這次「百年人文傳承大展」計畫，要特別感謝總計畫主持人楊儒賓教授的邀請，將原先以人文學科各學門為主的共同出版與展示計畫，擴展到歸屬於社會科學領域但卻十分具有人文學色彩的人類學及宗教研究。接到楊教授的邀請，我個人十分惶恐，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恐難擔負起此一重大而複雜的任務。由於這個計畫既要熟悉人類學百年來的學術發展史，又要具有規劃文件與文物展示的工作經驗，對於任何一位學者來說，挑戰性極高，更何況我個人的資歷尚淺，臺灣人類學的發展史與博物館研究亦非我的專長，但我還是不假思索的答應了。理由無它，藉由參與這一次百年人文大展的出版與展示計畫，我希望人類學門有機會發聲，好讓社會大眾多多認識人類學，理解什麼是人類學、人類學家在做什麼，以及過去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為何。

人類學在國科會人文處各學門中，屬於小學門，學界人數少，但是研究領域卻涵蓋甚廣而且多元。其所涵蓋的分支領域，包括考古學、文化/社會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語言人類學，以及近年來備受社會大眾重視的博物館學等，實跨越了人文與社會科學二大領域。在國內人文社會科學各學門中，人類學的知識傳統有其特殊性與重要性，尤其是考古學、臺灣南島民族（即原住民族）研究、傳統漢人社區及社群研究，以及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等。要介紹人類學百年來的學術發展史並不容易，該如何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來讓社會大眾認識人類學及其知識發展重點，已屬十分困難。況且，參與此計畫的學門眾多，各學門的關懷重點差異頗大，單一學門可以發揮的空間相當有限，我們該如何配合總計畫的整體規劃，來呈現人類學門的學科特色，凡此

\*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科會人文處人類學門召集人。

都是我們在執行計畫時所面對的問題。

還好，人類學有許多相關的博物館資源，展示人類學家的研究重點與成果並非難事，只要展示一些各博物館所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田野照片與標本文物，應該就具有很好的推廣效果。雖然我完全沒有規劃過博物館的展覽經驗，但我們這個計畫中的三位共同計畫主持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臧振華教授、民族學研究所的張珣教授及臺灣大學人類系的童元昭教授），均或多或少有規劃過或參與過博物館標本的蒐藏、整理與展覽等經驗。他們三位所服務的學術機構均設置有博物館或標本室，對其館藏的標本文物相當熟悉。於是，我們這個介紹人類學百年學術發展史與文物展示的計畫，就在大家一致體認到推廣人類學知識的重要，且在彼此分工合作的氛圍下，參與了這個以人文學科為主的盛會。除了我們四位撰稿人之外，我們也邀請了中央研究院院士兼民族學研究所所長黃樹民教授來書寫總論，與其同所的陳文德教授則負責介紹臺灣南島民族研究。

介紹人類學百年學術發展史與特色，可以時間作為分期，試圖結合學術發展階段與當時國內外的政治社會環境之關係，來呈現各階段之重要學者與研究成果。除此之外，還可以使用學科的次領域的分類準則，例如考古學、生物人類學（或稱體質人類學）、文化／社會人類學及語言人類學。另一個分類的標準則使用區域研究的概念，以研究對象與區域內的族群與社會文化特色來介紹人類學，例如東亞研究、東南亞研究、南亞研究、中南美洲研究、非洲研究、大洋洲研究等。臺灣人類學的發展，在過去由於受限於研究經費、研究田野的可及性等問題，主要以研究者個人所隸屬之國界範圍內的族群社會文化作為研究對象，因此多集中在臺灣與中國二地，直到1987年政府解嚴及研究經費之使用逐漸放寬後，才擴展到東南亞與大洋洲等地。因此，我們的書寫分工，兼具了二個分類概念：人類學的次領域與區域研究。我們將介紹考古學及與文化／社會人類學，在文化／社會人類學下，再細分為研究成果較具特色的南島民族研究、漢人社會研究、中國社會研究，以及近年來逐漸興起並備受重視的博物館研究。至於時間軸線，則貫穿於每一篇分論論文的回顧架構中。

總論的撰稿人黃樹民院士，將人類學的百年學術發展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學科的萌芽期，從1911-1949年，中國學術界開始學習歐、美、日等國之人類學與民族學的概念、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以中國境內的研究對



象與題材作為探究的主題，而逐漸將人類學發展成一門正式的學科。第二階段稱為復原期，從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後到 1987 年政治解嚴之前的這一段時間。此時期，多位萌芽時期的人類學與民族學者隨國民政府來臺，推動以臺灣本地為主軸的人類學與民族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建立起臺灣人類學完整的學術養成架構，也奠定了臺灣人類學的研究發展傳統。第三階段則從 1987 政治解嚴之後迄今，我們稱之為多元發展期，臺灣內部的族群與社群運動蓬勃發展，相關的社會議題及弱勢團體問題成為了這個時期人類學研究的新趨勢，包括族群、階級、性別、環境、博物館、視覺人類學、國家與地方的關係等，發展出更為豐富與多元化的研究成果。

楊儒賓教授以雙源匯流來描述 1949 年以來人文學科在臺灣發展的特殊學術奠基背景。固然，人文社會科學在臺的學術建制，主要來自二個學術傳統所開發與傳承的資源：一個是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於大學教育的學科建制，以及當時多位日籍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另一個則是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大陸學者所帶入的中國傳統與經驗，以臺灣作為基地而建立的體制化的學術機構與人才養成體系，一方面培養本地年輕的學術人才，一方面則將他們早年在中國的研究經驗、理論與方法，應用在臺灣本土的研究對象與議題上。

然而，人類學乃是由歐美所發展而引進的新興學門，除了這二個源頭所注入的學術養分外，更重要地，則是來自於歐美的學術傳統與資源的影響，無論是日籍學者或中國大陸遷臺的學者，都受到該傳統與發展方向極大的影響。雖然學者各自所偏好與追隨的理論與研究方法派別可能不盡相同，但整個學界仍然以歐美人類學及民族學的學術發展方向，作為人才養成與形塑研究議題的標準範例。日治時期日籍學者所建立的學科基礎，國民政府遷臺後大陸學者所匯入的研究傳統與經驗，此雙重資源都是人類學在臺發展的基石。然而學者從歐美學術界所攝取的養分，亦是人類學得以在臺建立完整的學術根基並持續發展進步的主要原因。

戰後臺灣人類學最重要的成就是完成學科建制化的教學架構，早期以臺灣大學人類系作為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人才培育機構，後來加上政治大學邊政學系（今之民族學系），以及更晚期的清華大學人類所、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等單位的設立，將人類學教學從北部擴展到花東海岸及中部的埔里盆地。在學術發展方向上，中研院史語所及民族所則長期耕耘本土的研究議

題，以其學術資源持續協助教學機構培養人類學專才，逐漸發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臺灣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社會文化研究。

而實地的田野研究訓練，是臺灣人類學界培育人才的教學重點，所有的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均需實際走入田野，進行田野發掘與調查工作，累積了相當多的田野經驗與研究資料，成為我們這一次展示人類學門百年人文大展的主要材料。從人類學家自己或帶領學生進入田野地的田野照片、在田野地所蒐藏的南島民族的日常生活器物、人類學者的田野筆記所繪製的文物圖與測量數據、考古遺址發掘的實際狀況、到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出版物，顯示了不同階段人類學的發展歷程。

關於分論的書寫，我們即以上述的架構來呈現人類學這百年來的發展。臧振華教授負責考古學方面的書寫，陳文德教授撰寫臺灣南島民族文化的發展，張珣教授書寫漢人社會研究發展，童元昭教授介紹人類學與博物館研究，而我個人則分擔中國研究方面的簡介。這個分論的架構乃是在考古學之外，以臺灣人類學發展較為蓬勃的文化 / 社會人類學的成果作為介紹的主軸，但我們卻著重在百年來臺灣人類學的教學與研究重點的區域，來書寫文化 / 社會人類學的分論：以國界內的族群特質與區域分布來呈現。當然，這個區域研究的特質，是以臺灣及中國作為國界的範圍，仍然存在著大中華民國傳統國界領域的舊思維，這可能是受到大陸遷臺學者在臺建立教學基地時，所匯入的舊思維之影響。

人類學在中國的萌芽、建立學科之際（1911-49），當時學者所探究的問題即圍繞在二個主要的關懷上：其一，受到種族中心主義論述的影響，試圖回答漢民族的起源、漢民族與其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為何等問題；其二，人類學在中國發展階段的初期，學者由於受到其所學習的西方知識典範之影響，分為「南派」或歷史學派與「北派」或稱功能論學派二大派別——前者以中國少數民族作為調查對象，關心民族的歷史發展、國族建構、邊疆安靖與族群融合問題，後者則以關切當代社會問題作為研究議題，主要以當時漢民族社區的發展與分配不均作為切入點，強調微觀實證研究的重要性。雖然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臺並在臺灣持續建立人類學與民族學基地的，以南派學者為主（如凌純聲、魏惠林、何聯奎、芮逸夫等），此種學術傳承派別的差異，卻影響了後來臺灣人類學在研究對象與議題上的區分，將臺灣本土的研究對象區分成南島民族研究與漢人社會研究，也成為臺灣人類學機構教學與



知識論述上的發展重點。而中國研究則是在 1987 年政府解嚴、開放到中國探親、進行學術與文化交流後，才成爲另一個受到各教學單位重視的社會文化區域。

在特寫方面，整個計畫主持群認爲臺灣人類學家的足跡可以用二個方式來介紹：一、以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來做介紹，即重要的考古發掘與人類學田野研究；二、以人類學家作爲主軸的人物特寫，介紹已過世但在臺灣人類學的學術奠基之時具有特殊貢獻的學者之生平與學術成就，此包括奠定中國考古與臺灣考古地位的李濟先生與張光直先生，以及早期從事中國少數民族調查並在臺灣培育學術人才的凌純聲先生及芮逸夫先生。

考古發掘工作是從古代人類所遺留下來的遺物與遺跡，來研究與重建當時所居住人群的歷史、社會與文化。在大陸時期的考古成就，以 1926 年發掘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在人類演化史上確定了中國猿人北京種的地位，以及 1928 年開始在河南安陽陰墟遺址開展的發掘工作，所出土的大批珍貴文物與史料，不僅證實了《史記·殷本記》記載的可靠性，也影響了當代學者對於殷商時代的歷史與社會文化研究，更是奠定了中國古代文明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歷史位階。

1949 年之後，臺灣考古學界的研究工作除了持續整理分析大陸遷臺的考古資料外，在不同階段也在臺灣本地進行廣泛的遺址發掘，建立臺灣考古文化年代學，以及對於臺灣歷史時期文獻記載所缺漏的當時人群的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面向，提供了獨特的資料與貢獻。而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則是考古學另一個層面的工作，不僅推動了考古學博物館的建立（例如，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考古學者也從以研究爲取向的象牙塔走出來，參與環境影響的評估、考古遺址的搶救、國家公園史蹟調查和社會文化教育等工作。

在文化 / 社會人類學的田野研究部分，我們主要介紹了四個影響深遠的整合型研究計畫：由已逝之國際知名考古學者張光直在 1970 年代主持推動的「濁水大肚兩河流域自然史與文化史科技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黃應貴教授在 1990 年代所推動的基本文化分類研究（包括人觀、空間、時間與歷史記憶及物等議題）、19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由中研院民族所李亦園院士及莊英章教授主持的「閩臺研究計畫」，以及由中研院語言所李壬癸院士主持的「南島民族的分類與擴散」之人類學子計畫（此包括

了考古學臧振華教授主持的「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的考古學研究：臺灣的證據」、南島社會與文化學者黃應貴教授的「文化與族群的形成與再創造：臺灣南島民族的研究」)。

這四個整合型計畫，對於臺灣人類學界的影響極大，不但開啓了科技或跨學科之間的整合研究典範，亦或針對人類學與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進行有系統的研究與對話，亦或開啓了臺灣與大陸學者之間的研究合作與人才培育，亦或以臺灣南島民族語言、文化與族群特色作為思考臺灣人類學對於國際學界產生獨特貢獻之可能。從 1970 年代開始迄今，這四個人類學的整合型計畫雖然已經結束，但其影響卻仍然存在。學界認為它們仍是臺灣人類學界未來可以持續探究的方向，我們還是需要追隨前人的腳步，繼續探究尚未完全解決的臺灣社會文化的基本問題。

最後，關於圖錄的文件與文物篩選及實際展示的規劃問題，我們當時是以研究主持群來分工，參與者就其個人所屬機構的蒐藏品中，挑選出具有代表性的物件來展示，包括田野調查的照片、博物館的標本、學者個人的手稿、具有教學與宣傳意義的紀錄片等等。這部分的工作，我要特別感謝三位共同計畫主持人，以及三位助理（王修文、巫淑蘭、林鼎盛）的協助，從人類學眾多的文件與標本中，挑選出具有意義與代表性的物件出來，讓整個展覽更為豐富而多元。在挑選物件與標本的過程中，當然我們也碰到了許多沒有預期到的困難與問題。例如，原先有一些預計刊登在圖錄的老照片及文件，但卻找不到清楚的版權歸屬，我們只好忍痛將之刪除。我們也將一些珍貴無價的考古標本剔除在展示行列中，因為我們考慮到此次三個展場安全設施不足的問題，將之刪除可以降低風險，也可以減輕主辦單位所無法承擔的保險經費問題。

此外，文件與標本的展示，涉及了單位與單位之間外借文物所需進行的行政程序，是另一項繁瑣的工作，此部分多虧了國科會人文處何醇麗小姐的協助，讓這麼繁瑣的工作得以完成。我們也要特別感謝照片與文物蒐藏人、蒐藏機構的協助，提供了我們這次展覽所需之物件，讓整個展覽得以完整，呈現出人類學家過往在研究與教學上的足跡。這些老照片、前人手稿、考古遺址標本、人類學博物館的蒐藏物件，以及展覽現場所放映的紀錄片等等，這麼多樣化的展品，各賦有其特殊的展示功用與意義，均多多少少觸動了觀賞者的感官經驗與知識認知層次，讓人領受到人類學知識的多元性與豐富性。



藉由書寫與展示前人的足跡，我們理解了前人研究歷程的成果與未竟之處，感受到他們在推動人類學知識時所散發出之熱忱與執著，也領悟到他們建立基礎教育時所秉持的理想及執行過程的艱辛，他們成就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臺灣人類學樣貌。此外，人類學知識的多元性、研究議題的有趣性，是人類學得以持續吸引後世學者進入此領域去追尋理想的關鍵所在。但是，我們也體會到人類學還有許多未竟之路，我們仍需努力，繼續追尋前人的腳步，替未來的一百年創造出可以展示給後人觀賞的成果出來。